

企业成长需摆脱政府“保姆式”扶持

■ 陈楚楚

在全球都数得着的赛维和尚德,曾一度是产业发展的骄傲、地方发展的楷模、企业致富的榜样,但是一旦面临风吹草动,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完全依靠政府。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光伏发电遭遇挫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过多地依赖政府投资是教训之一。光伏发电是少有的一个完全靠政府支持而迅速发展壮大的产业。这个产业本是新兴战略产业之一,但是在一些地方政府保姆般的扶持下,却迅速沦为以加工为主的“新的旧工业”。政府对于这些亏损的企业处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当年种下的是摇钱树,结果拔苗助长,最后成了填不满的销金窟,却还想着要砸钱继续包装成摇钱树。这样自欺欺人的逻辑显然要不得。

可以这样认为,依靠政府而不是市场,是积重难返的一种经济症结。所幸十八大报告已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改革的核心。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揭示了新发展方式的新动力。报告指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前提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我们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动力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个是依靠谁,二是依靠什么?我们的回答是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依靠科技创新,而不是人口或土地等政府掌握的资源。

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推动力量中,消费推动作用持续下降,而投资与出口的作用持续上升。这就是说,政府投资是主要推动力量。查询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发现,2000年最终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为65.1%,在十七大举行的2007年,当年14.2%的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贡献率下降到39.2%;2000年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为22.4%,2007年提高为42.7%;政府投资贡献率居高不下,证明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于政府。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还有一个依靠什么的问题,这是根本驱动力问题。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新能源与信息革命,这些将决定中国转型工业化的道路,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美国的苹果控制台湾的鸿海,而鸿海与深圳的富士康控制中国广袤大地的几十个县级政府与几十万工人,这是一个活的经济案例,一种典型中国的方式。当然中国也有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地位正如沙特在石油产业中的地位,但受制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网接入与利益集团原因难以顺畅接入电网,导致强大产能白白空置。这一切都在说明,企业的转型需要创新。正如广发证券分析师李竞华认为,中国企业应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技术研发等途径掌握核心技术,拥有核心竞争力,才能从“卖苦力”向“卖脑力”转变。

这两种动力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在更多领域,那些障碍——资本与技术之间的障碍,技术和产业之间的障碍,产业与市场的障碍,国内与国外资源的障碍——唯有通过制度变革,才有可能被不断打破。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近年反反复复说,“制度重于技术。”而制度变革的核心,正是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核心“处理好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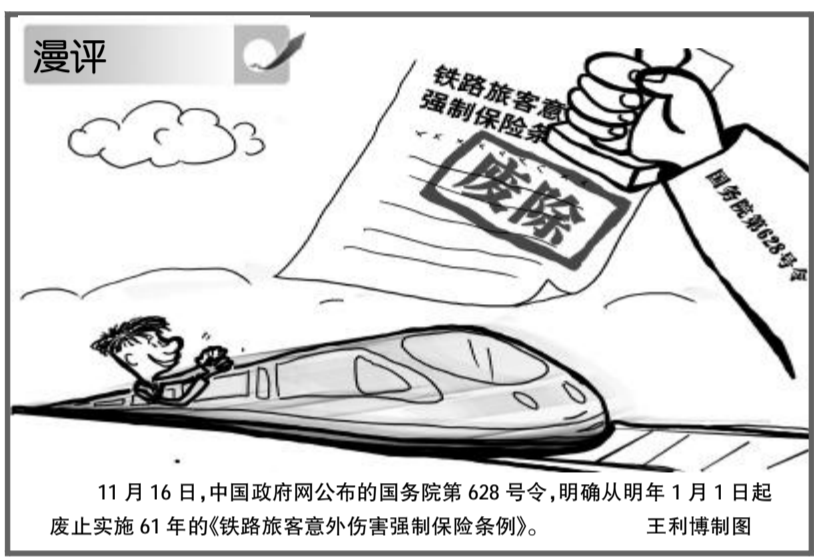
经济学认为: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来讲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和大规模政府投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原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优势开始减弱,“土地财政”无法持续,使得原本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外延式、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继。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靠深化改革来形成“制度红利”,促进经济内生增长。

企业发展的最终动力是什么?就是要全面整合创新资源,推进技术创新工程,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高技

术化,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要优化创新环境,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扩大科技开放合作,推动开放式创新。要做的事很多,以上这些话也算不上是什么新话,只是强调发展动力怎么形成的途径。

类似光伏这样一哄而上、一放就死的产业模式,本质上应该扬弃。还有完全依靠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的体制,也该结束了。在今天的中国,政府的转型,将为经济的转型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撑。因为,新一轮繁荣的核心驱动力,在市场,而非政府;在科技进步,而非廉价劳动力。

希望更多的企业理解十八大报告关于发展的动力与改革的核心这两句话的含义,从光伏产业的教训中有所清醒,谁早清醒早主动,谁早理解十八大报告精神谁就赢得主动。



改革最关键时期在未来三到五年

(上接第二版)

重启改革国有企业要进一步市场化

《中国企业报》:改革步入深水区,国有企业的改革必然触动部分人的利益,您如何看待阻力?

李稻葵: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领域的矛盾非常突出,最需要的几项改革已经相当明显,基本的社会共识是存在的。国有企业不改革不行,目前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占有太多经济资源、政府资源,同时效率却不那么高,必须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对经济大局有好处,对国有企业的职工、经理阶层也会是一种激励,他们也是受益者。我不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会导致一些人输、一些人赢,相反,都是赢家。

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市场化。国有企业应完全推向市场,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一视同仁,人员任免、薪酬待遇、经营管理完全市场化运作,脱离行政干预。国有资本应适当退出,同时,出售部分国有资产的收入可以为未来增加的财政支出提供一部分资金来源。

《中国企业报》:10月10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从一个完全信赖政府、信赖计划的模式转向越来越尊重市场和个体,您如何看待它的意义?

李稻葵:改革要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大幅度改革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方式,这并不是指完全取消行政审批,而是把行政审批的过程尽量地科学化、专业化、透明化,而不是垄断在政府部门。

将大量不必要审批的决策交给企业家,而把核心决策,如环评评估问题,交由临时组成的匿名专家委员会执行。这种匿名的专家委员会相对于目前的纯粹行政审批而言,更加具有客观性,也不容易被利益相关者所左右。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释放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减少暗箱操作和腐败的可能性。

《中国企业报》:市场化改革,相关配套的社会保障、法律环境该如何跟进?

李稻葵:夯实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福利基础。建立最基本的、面向百姓的福利制度,减少百姓对于实行市场经济的焦虑感,让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有最基本的福利保障,这其中包括基本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保障。只有这样,才能让百姓进一步认同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进一步完善司法改革,提升司法部门的权威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跨省跨地区的审判制度,降低地方政府对司法系统的干预。除此之外,还需要完善针对行业的专业审判体系。以针对股市的司法改革为例,有必要把所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诉讼司法程序集中于北京、上海或者深圳,专门在当地高级法院设立证券审判庭,主导证券案件的侦查、诉讼和判决。这将大幅提高证券司法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促进行业的蓬勃发展。

《中国企业报》:您研究的公共财政、金融系统领域,改革的突破点有哪些?

李稻葵:公共财政改革需要新思维。其中,税制改革的关键是要理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要按照地方民生支出需要配比进行转移支付,同时要进一步增加资产性和资源性的税收。未来房产税应作为地方财政改革的突破口,其收入可交由基层政府负责,用做当地公共设施建设维护、提供公共服务,并要收支透明、公开,纳税人可实时监督。公共财政改革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政府资产负债的改革。中国的公共财政跟西方完全不同,各级政府拥有大量的资产,同时也有负债,资产负债表的管理涉及公共财政的长期稳定发展。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过去依赖土地融资的方式不可持续,未来完全依赖地方税费的方式也不可行,更合适的方式是通过持有部分公共资产获得长期、可持续的收入,比如,地方政府可以土地作投入,与房地产商共同开发并持有部分房产,将其按市价或优惠价格对外出租,这样既增加了公共住房的供给,也可以作为地方政府长期稳定的财政来源。

金融系统改革需要实质性推进。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在于银行,化解风险的关键在于资产证券化。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过于庞大,占GDP的比重超过了200%,远超过A股市值所占GDP的比重。为降低风险,可以通过银行资产的证券化,把一部分成熟的资产卖到债券市场,且要求银行之外的投资者购买这部分资产,这会使得银行再融资压力减小,更重要的是,银行的部分资产会转移到债券市场,这就降低了资本市场配置不平衡所带来的风险。除此之外,银行也可以轻装上阵,把精力放在寻找更好的投资项目上,使其主业能更有效地运营。银行系统的改革还需要强调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的利润非常高,银行业垄断的情况非常严重,因此要鼓励利率市场化,提高银行系统的运行效率。

资本市场,股市改革必须标本兼治。治标方法有三:一是使IPO适当放缓;二是动员一部分长期资金投入股市;三是适当地把股市债券化,即要求企业分红,让股民不依赖内部信息,而是可以直接从分红中获得长期持有股票的收益。在治本方面,主要还是在制度上解决问题,通过证券司法改革,完善行业内的审判制度,降低地方政府的干预度,促进股市的健康发展。

《中国企业报》:改革不是纸上谈兵,您对改革的成功是否充满信心?

李稻葵:在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的前三到五年,中国经济将是困难的,但是,这种困难完全能够转化为改革的动力。通过国内经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以及国际社会的积极运作,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经过这一系列努力,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的后半段有望出现一个比较快而且可持续的发展格局。这种前低后高的发展趋势,不仅是良好的愿望,也完全能够成为未来十年发展的现实。

对话

中小企业的春天不再遥远

——专访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周德文



周德文

■ 本报记者 李岷

十八大报告中,对非公经济的阐述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内容。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结合十八大报告,就金融改革、税制改革、科技创新等话题,采访了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中国企业报》:十八大报告指

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未来,您怎么构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前景?

周德文:毋庸置疑,十八大之后中小企业的地位肯定会得到进一步提升。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经历了消灭—有益补充—组成部分—毫不动摇支持等不同阶段,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我感觉,未来政府会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真正打破利益集团对相关行业的垄断,使中小企业进一步获得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真诚希望“老36条”和“新36条”在推行过程中总是遭遇“玻璃门”的现象能够被打破,政府能进一步强化依法治国的理念,更好地维护中小企业主的合法权益。

《中国企业报》:十八大报告指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您认为,中国实体经济未来如何才能摆脱虚拟经济的困扰,实现突破性的发展?

周德文:防止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是我多年来不断奔走呼号的一个内容。在现今这个浮躁的社会,资金大量流向股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这个现象非常可怕。实体经济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打牢靠了,中国经济才能一步步走向繁荣。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辅助和补充,如果离开了实体经济,其最终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未来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回归到应有的位置,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重大命题,我们一定要正确认知和处理两者的关系,大力培育新型产业,促进实体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中国企业报》:十八大报告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也在创新,但目前许多中小企业只注重短期经济效益,缺乏长远规划,未来,这一局面如何得到改善?

周德文:就中国中小企业而言,

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不多,已成为制约这一经济群体深入发展的短板。多数企业家都是“近视眼”,投资项目只追求“短平快”,非常看重短期效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看到什么项目好,大家一哄而上,赚一把就走。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这样做也许能赚些钱。一旦经济环境恶化,这样的企业往往一点招架能力都没有,只能坐以待毙。

十八大把科技创新摆到“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一提法非常好。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对国家如此,对中小企业同样如此。中小企业一定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不能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在企业的战略规划中,要有主动创新的意识,积极研发新产品,让市场跟着自己走,而不是一味地跟在市场或同行的后面走。只有那些真正拥有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的企业,才能抵御得了外部风险,最大限度地释放生存压力。政府应积极鼓励企业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为企业创新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

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产融结合、产信结合

——专访十八大代表、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

■ 本报记者 李华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概念是在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到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企业报》记者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十八大代表、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

《中国企业报》:据了解,沈阳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试点城市,请根据您的经验,提些意见和建议。

关锡友:在我们以往的实践中,我们认识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产融结合、产信结合。首先,要把产业和金融实现集成和整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经济发展

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分离的。其次,传统产业和信息化要深度融合,植入最核心的信息技术,也可以理解为装备制造智能化。智能化导致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中国的工业已经不必再走或者说有了不再走西方老路的历史机遇,这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所体现的,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此外,还需要有再制造的思维,利用最少的现有资源来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沈阳机床去年机床产量达到10.5万台,这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数字,也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投入。当具有了再制造的思维,在产品之初就会有全生命

周期的概念,在总体上就会大幅度减少社会资源的消耗。

《中国企业报》:新形势下,十八大报告对未来工业化道路做出长远规划,作为重工业集聚的沈阳工业区,如何适应这些变化?

关锡友:十八大报告为沈阳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指明了方向,这对我们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以沈阳机床为例,实际上,我们的企业组织已经进行了一个彻底的转型。传统的企业组织是功能性的,现在沈阳机床正在由以生产制造为核心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建立起以市场和客户为导向的组织。

《中国企业报》:企业的转型固

然重要,但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影响甚至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您怎么看它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系?

关锡友:我认为,具备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企业能否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我们做存量和服务,必须有一个核心技术,改造、升级存量机床。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经过不懈的努力,沈阳机床终于在2011年底获得开发出了独有知识产权的“飞阳”数控系统。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我们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响应中央领导的号召,争取迅速做大“飞阳”数控系统,与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法纳克竞争,三分天下有其一。